



二十世纪 人类的奇迹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胜利 60 周年文集

程安辉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二十世纪人类的奇迹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论文集

主 编

程 安 辉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人类的奇迹: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论文集/程安辉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7
ISBN 7-80091-839-4

I. 二… I. 程… III. 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1936)-
中国-纪念文集 IV. K264.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7813 号

二十世纪人类的奇迹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63017788-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平谷玉福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00 千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1-839-4/K·71

定 价: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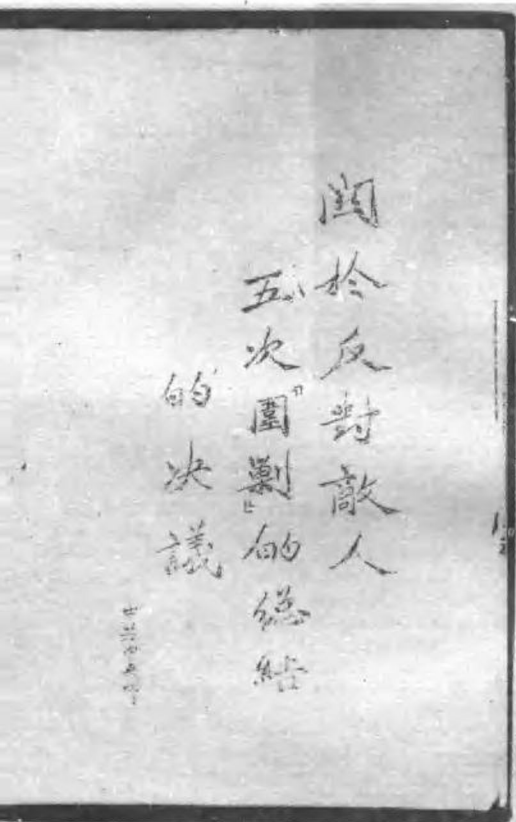
长征出发
地——瑞金



红军湘
江之战渡河
点——界首



吴起镇



黎平会议旧址



会宁会师楼

《二十世纪人类的奇迹》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安葆		
副主任	王顺生	鲍晓娜	程安辉
委 员	张培森	罗正楷	梅敬忠
	周继强	鲍晓娜	王顺生
	程安辉	李安葆	
主 编	程安辉		

目 录

遵义会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

- 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胜利…………… 李安葆(1)
- 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中的历史作用 …… 张培森(14)
- 《遵义会议决议》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地位 …… 李安葆(30)
- 关于遵义会议的几个问题 …… 李安葆(41)
- 遵义会议反应述评 …… 李安葆(53)
- 黎平会议在红军长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 郭德宏(61)
- 红军长征初期的失利及其历史教训 …… 程安辉(67)
- 红军长征与毛泽东军事思想 …… 李安葆(82)
- 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与红军长征 … 李安葆(99)
- 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得意之笔”岂容涂抹

——驳王明、李德关于红军四渡赤水之战的谬说……

- …………… 张国星(132)
- 论周恩来在红军长征中的思想发展与特殊贡献…… 黄少群(152)
- 论张闻天在长征中的历史作用…… 张培森、程中原、李安葆(166)
- 英明果断之举

——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单独北上 ……

- …………… 双 胜(180)
- 长征中的任弼时…………… 洪 明(194)
- 瞿秋白与长征…………… 李安葆(207)
- 鲁迅与长征…………… 李安葆(211)
- 宋庆龄与长征 …… 李安葆、洪剑斌(220)

红军长征与华北事变	李安葆、程安辉(225)
红军长征与“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联系	李安葆(245)
红军长征与两广事变	李安葆(255)
红军长征与北平地下党	李安葆(267)
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的丰碑	李安葆(277)
红军长征中的后勤供应工作	程安辉、郭森(293)
红军在长征中的商业活动	刘录开(310)
红军长征与宗教	李安葆、胡本志(319)
长征文化初探	李安葆、仪根平(340)
长征诗歌略论	李安葆(377)
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的文化学习生活	李安葆(387)
相似的态度 不同的道路	
——评遵义会议前后的何克全与张国焘	李安葆(391)
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问题	
——评《我对长征历史意义的理解》	程安辉(398)
长征精神简论	周贵卯(406)
红军长征的国际影响	李安葆(416)
长征与艺术	程安辉、梅敬忠(429)
后 记	(449)

遵义会议——马克思列宁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 实践相结合的光辉胜利

李安葆

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从而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大大加快了我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

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可是，在遵义会议前，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而遵义会议，则开始改变了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从而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危局。

—

遵义会议具有一个显著的历史特点：它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它独立自主地确立了自己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英明领袖，独立自主地领导和指挥革命战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大胜利，是党内

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大失败。

遵义会议的特点反映了我们党的成长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它表明党具有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能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它标志着党在政治上、理论上走向成熟。

正因遵义会议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特点,因而它不断遭到教条主义、机会主义者的攻击和诬蔑。王明说:遵义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①。李德则说:遵义会议召开时与“外界隔绝”,“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毛泽东能不顾马列主义的干部(即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等——引者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②。他们集中攻击遵义会议的一个共同点是,说这次会议是反对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路线的。

诚然,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令下进行的。当时,中央红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长征时,党中央已与共产国际失去了电讯联系。其实,这恰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客观条件。在会上,毛泽东等同志不受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原则,正确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有力地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成功地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保证了中国革命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正是遵义会议的巨大历史功绩,使它成为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而载入史册。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呢?大家知道,自党的成立至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以前,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往往照搬外国的经验。又因我们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在决定中国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时,往往是听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从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前的14年中,党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从党的一大到六大、八七会议、六届三、四、五中全会等),都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代表的参加。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斗争起过推动、帮助的作用,有些指示也是正确的;但由于共产国际对各国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的深入的了解,因而有些指示是不正确的;而在斯大林领导共产国际期间,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因而它给中国革命斗争带来了不良影响和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曾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③

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在党内实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统治,压制党内正确的意见,窒息党内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和朝气蓬勃的生机,把中国革命事业推向了极端危险的境地。

但是,在我们党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对党内流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例如,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便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大声疾呼,全党和全体革命干部:“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当时毛泽东同

志虽只是一个红军政委和前委书记,但他提出的问题是重要!何等尖锐!可惜,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视,这反映了党在政治上、理论上还不成熟。

但是,到了遵义会议,我们党经过了14年艰苦曲折的斗争,广大党员和干部从多次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对比中,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反复实践中,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识别能力,终于认识了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同志。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长期统治,把党引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只在到了遵义会议(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④

二

遵义会议是怎样克服“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呢?这次会议,不仅没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干预,而且对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和以往党的历次重要会议是不相同的。我们从会议内容本身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历史特点。

遵义会议着重讨论和解决的迫切问题是军事和组织问题。

首先,在军事上,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一场大争论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会议在讨论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时,系统地批判了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军事顾问李德,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主要指挥者,也是军事教条主义的代表。1933年秋天他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拒绝听取不同的意见,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中极力反对毛泽东等同志在过去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反对已为反“围剿”战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硬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红军的经验,鼓吹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同敌人打堡垒战和阵地战。朱德同志痛心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拚”^⑤,使红军陷入了困境。成仿吾同志也回忆说:李德在瑞金的住处有三间房子,中间室内挂满了地图,他就是按照地图来指挥红军作战的^⑥。然而,这些地图都是些简单的草图,误差很大,不准确的。李德布置红军作战时,不管红军行走的是山路还是平路,根本不给部队留下吃饭和休息的时间,也不考虑当时敌情、气候、自然条件等具体情况,只凭比例尺测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作战的路程,决定战斗的时间。这是典型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瞎指挥。

当时,许多红军指挥员对李德、博古的这种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的瞎指挥是很有意见的,认为军委规定的任务过于具体,下级没有机动的余地,往往难于执行。彭德怀同志在给军委的信中指出:“我们每一次接受军委电令,差不多完全没一点思索的时间”^⑦。可见,李德、博古的瞎指挥给红军指挥员带来了何等困难、被动的局面。

可是,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却不承认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博古在所作《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中,极力为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进行辩护。为此,遭到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等同志的有力批驳。会议作出的《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这是“五次‘围剿’不能在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

会议《决议》以简明概括的语言,总结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根本

分歧,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否定了博古、李德的消极防御的指导路线。

会议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战争的具体实践,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了李德等的军事教条主义。对李德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鼓吹阵地战、堡垒战,到退出根据地时实行逃跑主义的一系列错误,都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针对李德主张只有用堡垒战、阵地战才能打破敌人的堡垒主义时,指出:“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即李德——引者注)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由于李德“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在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最后,针对李德在红军突围时所犯的严重错误,指出:“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会议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李德等在军事上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指出其错误产生的根源:“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的不了解”,是军事教条主义造成的恶果。

会议在批判李德等的军事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复强调领导中国红军战争,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规定和制定红军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

第一,关于红军的组织形式,会议指出:“红军的编制,一定要

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不可照搬苏联红军或外国军队那一套组织形式；而李德等实行“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命令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去单独作战是不对的”。

第二，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强调应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敌强我弱、长期持久、内线作战等特点，实行积极防御（决战防御）的战略路线。会议指出：“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非常不够，在我们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而李德等推行的“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

第三，关于红军战争的作战形式，强调应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的特点而采取正确的作战形式。会议指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不应照搬外国阵地战，堡垒战的形式，“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强攻敌人的堡垒，是应该拒绝的”。而李德等“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否认诱敌深入的作战方法是错误的”。

在整个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在关于红军战争方针等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毛泽东等同志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红军战争的特点，实事求是地有理论、有分析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严肃地批评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这种不迷信外国，不迷信教条，不迷信共产国际，不迷信军事权威，这种敢于向教条主义、向权威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精神，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等同志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勇气和魄力，反映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等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实际能力

和理论水平。

在会上,真理在毛泽东等同志一边。因而,李德只有哀叹“在遵义人们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代表”^⑧。“无可奈何花落去”,他虽曾发言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企图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和别人身上^⑨,但毕竟是理亏、徒劳的。后来,李德不得不承认:“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⑩”。

这次会议,由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军事路线作为我党我军的指导路线,才有后来的四渡赤水之战的胜利,才有长征的胜利,才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同时,由于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军事思想作为我们党领导革命战争的指导思想(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实际上就成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重要开端。

其次,在组织上,遵义会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内斗争的学说,结合中国党的实际情况,在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过程中,实际上开始按照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而不是像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所采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这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克服党内错误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指出:“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这表现在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⑪

过去,在党内斗争中,存在着过火斗争和单纯强调组织处理的偏向。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着重从思想上、从教育上着眼和解决问题,而是单纯从处罚、从组织上处理和解决问题。例如,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所犯错误的处理便是如此。毛泽东同志曾形象

地揭露了这种倾向，他说：一声吼，陈独秀不见了，但陈独秀路线的思想影响还在；一声吼，李立三不见了，但立三路线思想影响还在^⑫。由于党内斗争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没有着重从解决思想着手，没有注重分析错误产生的社会的历史的根源，这就不可能帮助干部提高思想觉悟水平，因而也就难于帮助干部避免或少犯错误。正如李立三同志在中共“八大”检查自己屡犯错误的原因时说：“因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真好象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进行党内斗争时，教条式地照搬斯大林那种处理苏联党内矛盾的方式，对党内不同意见采取过火的斗争，甚至当敌我矛盾处理。毛泽东同志指出：“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⑬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大肆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当时不积极拥护、不积极支持“左”倾冒险主义的干部，便扣上“富农路线”、“罗明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两面派”、“取消派”等大帽子，用撤职查办、开除党籍、劳动改造等方式严厉惩办这些干部。他们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展了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堵塞了生动活泼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作风的发展，造成了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严重危机。

遵义会议则不然。

它没有照搬外国党的经验，没受斯大林、共产国际的不良作风的影响，而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根据中国党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实际情况，事实上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基本精神，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斗争。在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鼓德怀、李富春、刘少奇等同志对李德、博古的